

明月映川水，公廉生明威

——穿越时空的为政之道

■ 张绪红

公正与廉洁，犹如明镜与明灯，既照见为政者的内心，也照亮前进的道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则36字为官箴言，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理念，穿越近六百载岁月洗礼，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追本溯源：从官箴到刻石的理念传承

先秦《荀子·不苟》篇中有“公生明，偏生暗”的表述，强调公正能够带来政治清明，偏私则会导致政治黑暗，这为“公生明”的廉洁行政理念奠定了基础。

“公生明，廉生威”则可追溯到明代理学家曹端。曹端为河南浞池人，因参加会试，登副榜第一，被授为山西霍州学正，从此步入仕途。其初入仕途，月俸并不高，但却能做到清廉自守，竭力助人。他的言行品德在坊间盛传，带动政风社风不断向好。公元1424年，升任西安府同知的郭晟临行向曹端请教为官之道。曹端对他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郭晟深服其教，到达西安后就将这段话刻在匾额悬挂起来。再后来，明代著名廉吏、山东巡抚年富对曹端的“公廉”说加以略改提炼，加上了“公生明，廉生威”六字，并亲自书写刊刻于石碑之上。自此这36字官箴作为对官员的训诫、约范和警示，成为明清两

代各级官衙不可或缺“标配”，并影响至今。

二、深刻内涵：公正与廉洁的辩证统一

“公生明，廉生威”这六个字，蕴含着深刻的管理哲学和道德智慧。

“公生明”即公正无私，是明辨是非的基石。强调在行使权力、处理政务时，要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偏袒、不徇私，明辨是非，洞察真相。中华传统文化中，除了“公生明，偏生暗”的论述，还有“举事不私，听狱不阿”，意即为国家办事不能存私心，处理案件时不能有偏袒。再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强调执法者需摒弃私情，公正裁决，等等。借古鉴今，只有以公正之心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决策，才能明察秋毫，看清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也才能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等涉及多方利益的事务中，确保资源分配合理，政策惠及广大民众。

“廉生威”即廉洁、清廉，是威望树立的根本。意味着要坚守廉洁底线，不为权力和利益所诱惑。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鲜明价值取向，《周礼》提出考察官吏要看“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从古至今，要求

没变，谆谆告诫之言犹在耳：廉洁是为官首要，一个清正廉洁之人，不会被私欲所左右，不会被利益所诱惑，下属会因其清正而敬畏，不敢懈怠；民众会因其廉洁而信服，愿意拥护；这种威严并非来自权力的强制，而是源自人格的魅力和道德的感召。

公与廉相辅相成。公正的本心需要廉洁的操守来支撑，否则可能会因利益输送而失去公正；廉洁的官员只有秉持公正之心，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谋福祉，树立起崇高的威望。

三、当代价值：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融合

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将“公生明，廉生威”的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工作岗位和每一个权力行使环节，让其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转而变成实实在在的行政实践。

第一，提升决策科学性。决策的科学性至关重要，秉持“公生明”的理念，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摆脱个人私利和偏见的干扰，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

第二，增强政府公信力。公正廉洁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一个廉洁的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更容易得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更好。相反，如果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就会严重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进而影响社会的

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 为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

■ 许张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求“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

一、绿色低碳发展新空间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绿色发展不仅是约束，更是拓展新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首先，绿色发展是“三重效益”统一的高质量发展，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将绿色发展贯穿全过程。浙江“千万工程”通过环境整治激活乡村旅游，正是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生动例证，表明绿色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同时，绿色发展也是推

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其次，绿色低碳借助创新、政策与市场力量，重塑产业、技术、政策与价值体系，开辟“四重新空间”。一是从“线性链条”到“网状生态”，拓展生产力新空间。推动产业模式由“原料—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流程转向“网状生态”。二是从“末端治理”到“源头创新”拓展技术新空间。绿色低碳倒逼技术革新，推动技术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创新”跃升。光伏、风电成本比过去十年下降超60%，为能源结构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三是从“行政约束”到“制度红利”拓展政策新空间。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政策工具从“能耗双控”转向“激励和约束并重”。碳交易、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机制有效降低企业转型成本，激发内生动力。四是从“产品功能”到“品牌溢价”拓展价值新空间。绿色低碳为产品注入生态价值，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显著提升，推动区域品牌塑造。

最后，传统产业需要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变革，通过构建“设计—生产—循

环—服务”全周期绿色框架，推动产业与自然系统协同。利用“产业共生网络”，实现资源共享与废物循环，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构建良性产业生态。

二、拓展沐阳绿色低碳发展新空间的实践路径

沐阳作为苏北工业大县，坚持“工业强县、产业兴县”，工业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对沐阳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沐阳加大绿色转型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当前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结构性的挑战。

面对新挑战，沐阳制造业绿色转型需以创新理念和务实举措，突破路径依赖，为实现从“工业大县”到“绿色制造强县”的跨越提供核心支撑。

一是强化理念创新，凝聚转型共识。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制造业全过程，通过干部培训和企业研修，提升推动绿色转型的能力与决心，引导企业

将环境效益纳入经营决策，营造全社会支持制造业绿色化的氛围。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绿色引擎。构建政产学研融合的创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实体，针对本地纺织、木材加工等特色产业迫切需求，攻关低碳胶粘剂、废水近零排放等关键技术。设立专项基金并引进高端人才，为制造业绿色化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三是探索模式创新，拓宽价值通道。重点打造“零碳园区”样板，在基础好的产业园集成应用光伏、储能、智慧能源管理等技术，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争创省级以上试点，形成可复制的制造业集聚区绿色转型示范。同时，推动构建绿色供应链，引领产业链整体减排。

四是深化制度创新，优化政策供给。完善绿色金融体系，鼓励银行创新“碳表现挂钩贷款”等产品，精准支持制造业绿色项目。改革考核评价体系，提高绿色考核权重，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激励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转型的长期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沐阳县委党校）

红色文化资源视角下 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探析

■ 张米米 宋怡

党外代表人士是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人才来源，党外代表人士的队伍建设在统战工作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培养一批与党同心同德、素质优良的党外代表人士是新时代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红色文化资源是涵养党外代表人士同心底色、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精神源泉，其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与时代精神，为当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深厚滋养和实践指引。苏北地区红色基因厚重，红色旧址、革命文献、英雄事迹等文化资源星罗棋布，所以要用好用活这些“红色富矿”，聚力打造共识平台，增进党外代表人士政治认同，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源源不断注入精神动能。

一是夯实基础，以“普查+政策”双轮驱动，激活红色资源价值

一方面，要通过实地调研、史料考证、口述访谈等方式对区域内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全方位普查，建立涵盖各资源点位详细状况的“全景式”数据库，包括地理位置、场馆概况、历史背景、发展历程等内容，并基于历史价值、教育功能、开发潜力等维度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级分类，让分散的“红色宝藏”聚合成体系化的“教育素材库”。同时根据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需求，协同相关部门开展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优化，提升红

色文化资源与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主题的契合度。

另一方面，要结合党外代表人士的职业分层特征与认知发展规律，积极推动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的配套政策，将红色文化教育学习纳入党外代表人士培养的常态化规划，明确学习时长、内容模块和体系标准。同时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统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整合优质师资、场馆空间、史料文献等核心要素，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向优质教育基地精准倾斜，促进基地课程体系的统筹设计与服务配套的专业升级。

二是革新形式，以“数字+教创”双向发力，提升红色教育实效

由于自然侵蚀、人为干预等因素影响，部分红色文化资源面临着损坏加剧、走向消失的严峻风险。为有效突破这一困境，要立足当下时代背景，将数字赋能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活化的核心抓手，比如通过高精度数字采集与建模技术，对相关遗址建筑、文献典籍、历史场景等进行全维度数字化复刻，实现对红色文化资源本体的永久性保护，再比如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场景化教育空间，使红色文化资源走向形象生动、可触可感的新境界。

当然，数字赋能不单单是技术的堆砌，更需要教育内容的创新优化。相关

部门要注重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内涵，深入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背后历史脉络、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的考证研究，提炼出具有独特性与感染力的红色文化符号。同时，打破资源壁垒，遵循“主题关联、地域协同”原则，将同一历史主题、同一精神谱系或同一地域内的红色遗址、文物载体进行系统串联，形成红色文化资源集群，创新设计模块化、体系化的教育内容框架，通过场景化叙事、故事化表达等方式，增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情感共鸣和政治认同。

三是深化质效，以“评估+反馈”多措并举，巩固政治认同成果

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探索建立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的认同度量化指标，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的实践中，首要前提是构建与红色文化价值导向相契合的评估体系。

一方面，对于受教者（即参加教育培训的党外代表人士），评估维度应锚定红色文化的认知转化与实践落地，结合培训出勤、知识测试等结果，参照工作实绩、家风建设、邻里关系等表现，从思想提纯、能力提升、作风提优等层面开展评估，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真正内化为受教者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另一方面，对于施教者（即承担培训教育任务、教学实施的主体），评估导向应聚焦其红色文化资源转化能力、红色党史教学适配能力和红色精

神价值引导能力的提升，常态化开展跨区域师资培训、交流研讨和成果展示等活动，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载体，持续强化施教者的教学专业能力，为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提供高质量师资支撑。

另外，坚持把科学评估、靶向反馈和整改提质有机结合，对照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目标，梳理存在的短板和弱项，建立分层分类整改和动态跟踪督导机制，形成“评估—反馈—整改—再评估”的完整闭环。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是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实践内容的重要资源。

强化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用好用活苏北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具有市域特色的“红色文化+统一战线”教育培训新模式，进而真正引导党外代表人士形成“国家发展与个人成长同频、个人价值与群众福祉共振”的家国情怀，让“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的光荣传统转化为共促发展的磅礴力量，携手绘就同心同向、团结奋斗的崭新图景。

（作者单位：中共宿迁市委党校、恩来干部学院）

■ 张琼

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作为四省交界的特殊经济板块，既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多个国家重大战略融通的重要纽带，也承载着盘活东中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使命。这片涵盖十个地市（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山东的枣庄、菏泽、济宁、临沂，安徽的淮北、宿州，河南的商丘）的区域，虽具备交通发达、产业基础较好等优势，却也存在行政分割导致的制度壁垒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合力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既是助力省际协同发展的关键钥匙，同样也是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的战略抉择。

一、破除行政分割，以制度协同降低交易成本

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瓶颈本质上是“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的矛盾冲突，而营商环境协同正是打破这一困局的突破口。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行政壁垒造成的规则异质性会显著增加企业跨区域经营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契约执行等隐性成本。因审批标准不统一，同一企业不同城市的备案时间往往要相差几天甚至一周，这种“制度性摩擦”已经成为要素流动的最大障碍。

合力打造营商环境能够通过规则协同实现交易成本的系统性降低。目前，徐州联合其余九市统筹谋划实施方案，创新搭建的苏皖鲁豫四省十市“跨省通办”平台共覆盖四省十市全部登记机构，设立73个服务专窗，推出“远程帮办、远程收件”服务模式，打破地域壁垒，以高效服务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当制度协同形成常态，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就能从“碎片化市场”转向“统一大市场”，为企业创造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

二、优化要素配置，以市场整合释放禀赋优势

要素自由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核心前提，而营商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指挥棒”。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徐州的装备制造技术、济宁的能源资源、临沂的商贸物流、宿州的土地劳动力，构成互补性极强的要素矩阵，但行政分割导致要素“流动不畅、配置错位”。例如，本地区内高端技师仍有缺口，部分城市职业院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不高，人才与岗位的错配源于跨区域社保、职称互认等制度缺失。

合力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生态系统”。在人才领域，可借鉴杭州都市圈“人才码”模式，推行区域内人才资质跨市互认，整合住房、教育等配套服务，破解“引才易、留才难”困境；在资本领域，扩大数字金融产品覆盖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利率；在土地领域，建立跨区域用地指标调剂机制，通过“标准地+数字见证”模式缩短审批周期，缓解工业用地紧张问题。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将直接转化为发展动能。

三、升级产业生态，以分工协同培育竞争优势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市场规模与深度分工的循环累积效应。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虽已形成装备制造、新能源、商贸物流等优势产业，但“同质化竞争、碎片化布局”问题突出。例如，四省多地同时布局光伏产业，导致产能分散；核心城市研发成果因转化机制缺失，难以辐射周边。这种产业生态的“内卷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基于统一营商环境的分工协同机制。

合力打造营商环境能够为产业链协同提供制度支撑。一方面，通过建立产业协同目录，明确徐州“研发中心”、宿迁“零部件制造基地”、宿州“组装加工枢纽”等差异化定位，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搭建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实现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质量检测的跨区域协同，提升产业配套效率。

四、提升区域能级，以环境优势抢占发展先机

营商环境已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地处长三角与中原经济区的“中间地带”，面临双重辐射的同时也承受“虹吸效应”，部分高端要素向沿海地区流失。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破解“虹吸陷阱”、提升区域吸引力的战略选择。

合力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能够形成“洼地效应”，增强对要素的吸附能力。从理论上讲，要素的空间配置始终遵循“趋优性原则”，即向制度成本更低、发展预期更稳定的区域集聚，而营商环境协同正是通过系统性降低“制度摩擦率”，将区域型造成要素集聚的“引力场”。从基础设施维度看，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往往难以承担数字化转型的高额固定成本，而跨区域共享基础设施相当于将“私人成本”转化为“公共成本”。这种基础设施共享的机制，不仅在于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减负”，更在于通过统一技术标准，避免区域内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与“标准不一”，形成“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网络，为要素流动与产业协同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当营商环境协同形成的“制度优势”吸引要素集聚，区域将逐步形成新的增长极，进一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打破传统“核心—边缘”的发展失衡格局。

总之，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合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意义重大。实践表明，单一城市的“单兵突进”难以突破行政分割的桎梏，唯有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纽带，才能实现“1+1>2”的聚合效应。从制度协同破解壁垒，到要素整合释放活力，再到产业升级增强动能，合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本质上是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这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更是区域崛起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中共宿迁市委党校）



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合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时代价值